



時流競說黃公度英氣

钟敬文文集

● 民俗学卷

残月海东云

謹系柳聖子先生論詩

絕句以祝賀頌于海日接

序鈔之重刊

钟敬文



壬戌初冬
北京

安徽教育出版社

鍾敬文文集

● 民俗学卷 ●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 / 钟敬文著.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4

ISBN 7 - 5336 - 2175 - 1

I. 钟… II. 钟… III. ①钟敬文 - 文集②民俗学 - 研究 - 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8955 号

责任编辑：黄书权

装帧设计：王为民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合肥南方激光照排部照排

印 刷：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1

字 数：500 000

版 次：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26.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 2651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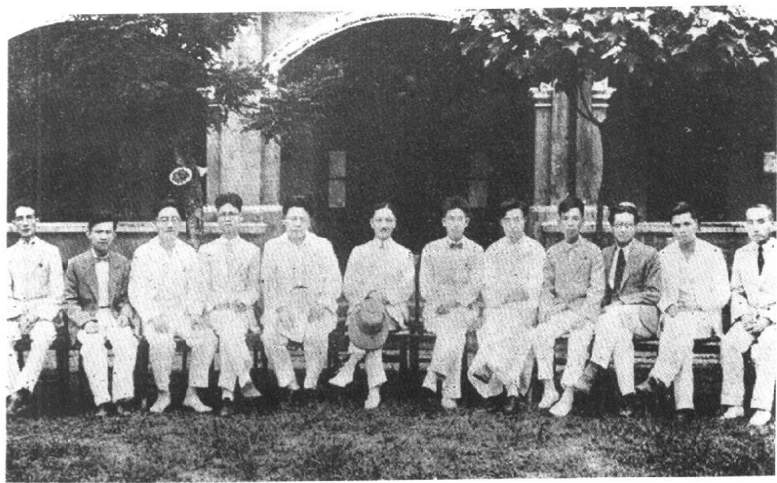
邮 编：2300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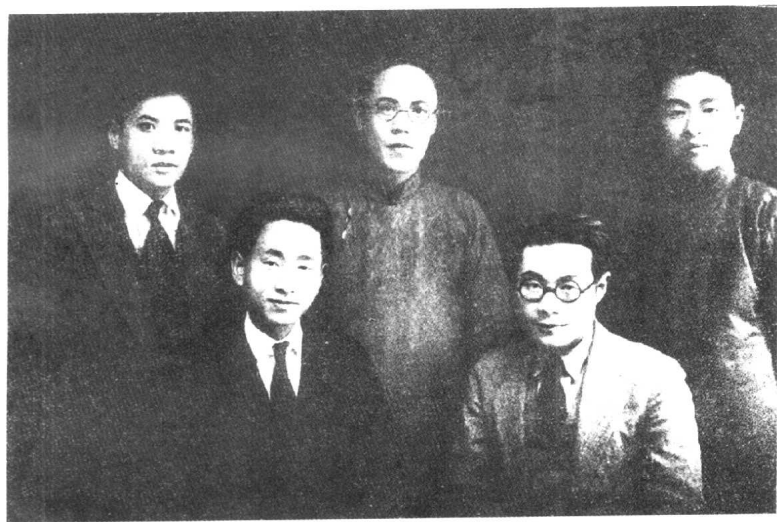
● 作者近照（摄影：侯艺兵）



● 接受中国文联“荣誉委员”聘任后留影（199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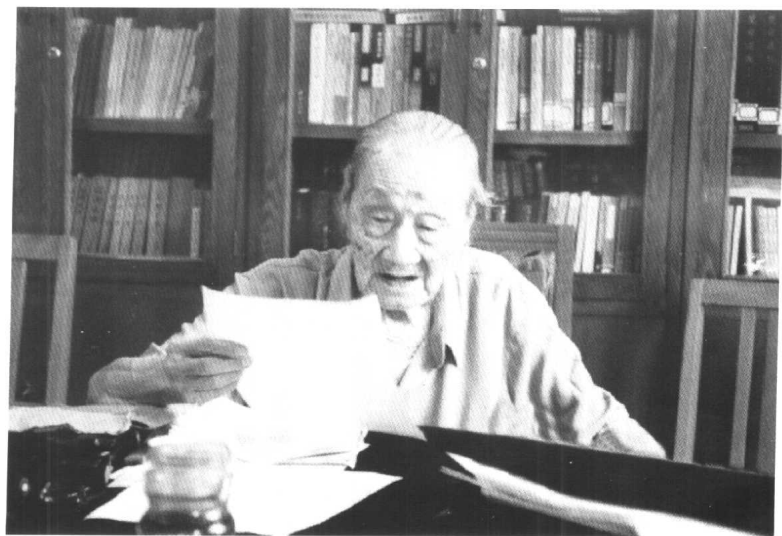
◎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人员留影。
右第三人为作者（1928年6月）



◎ 去国留学，中国民俗学会在杭州部分
同仁送别留影。前排右为作者（1934年春）



● 在泰山上留影(1990年)



● 作者在图书室中(1998年7月)

時流競說黃公度英氣
終輸倉海昌戰血老園
心未死寒心孤殘月海東雲
誰系柳亞子先生論詩
絕句以祝賀顧亭海日樓
詩鈔之重刊

鍾敬文



壬戌初冬
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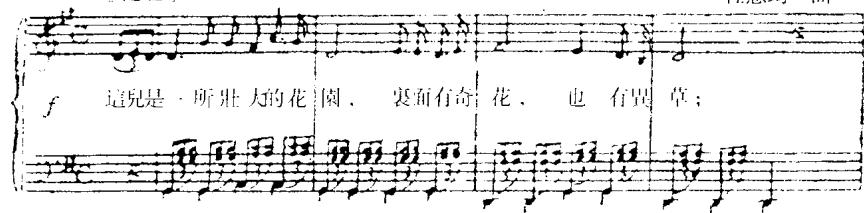
moderato

健壯！

中國民俗學運動歌

鍾敬文 詞

程懋筠 曲



● 中国民俗学运动歌 (1930 年)

《钟敬文文集》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铁梁	刘锡庆
杨占升	杨利慧
连树声	赵仁圭
赵世瑜	黄书元
黄书权	童本道
董晓萍	蔡清富

本卷编纂者

连树声

扉页题字

启 功

责任编辑

黄书权

责任校对

万 毅

装帧设计

王为民

出版说明

这套文集，比较完整地辑集了钟敬文先生生平的学术论著和文艺创作的绝大部分篇章。钟先生在学艺方面涉足颇广，从事的年份又相当长（70余年），所写作已经发表或未发表的文字，自然不止于此。但是，重要的或在学艺史上与之有关的篇章大都已搜罗入集。

我们根据所辑文字的内容，大略分为五卷：

1. 民俗学卷
2. 民间文艺学卷
3. 诗学及文艺论卷
4. 散文随笔卷
5. 新旧体诗歌卷

如上所述，钟先生的学艺活动涉及人文科学的几个方面，并且所跨年度较长，在某些学科方面（如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他的研究还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比较完整地辑录他的著作，就成为保存这个世纪学艺文献的必需工作。

其次，钟先生的这些著作，在过去发表的各时期里，曾受到学界相当读者的阅读和研究者们的探索。但过去发表的著作，大都比较零碎，使人颇有难窥“全豹”之憾。这套文集正是为了弥补这种缺憾而编辑、出版的，相信它会给读者和研究者以较大的方便。

以上两点,是我们编辑这套文集的主要目的,希望我们的实际工作,能够不辜负这种良好的愿望。

钟敬文文集编辑委员会

1997年8月于北京

自序

一、在民俗学几个方面的活动

一般地说,民俗学的主要任务,是探索、研究民俗事象(包括有关理论)。但是,作为一种科学,民俗学的活动范围,除了这种任务,还有种种的其它方面。例如活动机构的建立,专业工作人员的培训,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专业书刊的编辑、出版,以及博物馆的设置,研究会议的召开,国际学术的交流,……活动事项是繁多的。单从研究本身的结构体系说,既有一般性的研究,如理论民俗学、应用民俗学等;又有局部性的研究,如民具民俗学、工艺民俗学、语言民俗学、宗教民俗学、文艺民俗学等。就是一种局部性的民俗学,往往又包含着若干支学,如文艺民俗学就包含有神话学、史诗学、传说学、童话学(民间故事学)、谚语学等。

总之,民俗学虽然只是社会科学或文化科学中的一科,但它自身又是一个大系统,它包含着众多的小系统的学科。它应该称为“民俗科学”或“民俗诸科学”,如包括众多学科的社会科学、文化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等那样。像这样活动范围广阔的科学,一个学者(他不可能有三头六臂)要包揽齐全是不可能的。例如美国的鲍亚士、日本的柳田国男,都是大师式的人物,他们不仅有优

异的成就和巨大的影响，也有广泛的活动领域。但是，他们也只是在学科的某些重要方面扮演了出色的角色而已。以柳田来说吧，他所涉及的领域不可谓不广，但是，像民具学、民艺学等，他就较少注意到；至于国际学术（民俗学）的比较和交流等，就根本不在他活动的范围之内。总之，不但一个学者有他精力、性向和环境等的限制，就这门学术事业本身的繁重性来说，它也决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能力所能完全担负得了的。这可说是一种自然的限制，人类对它一时是不可能突破的。

在民俗学领域的活动，我虽然参与较早，并且能够贯彻始终。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的限制，我也远远不能做到包揽一切的地步。平心说来，在这方面，我只是一个耕耘时间较长、涉及的园地较广的诚实的农夫而已。

历史不仅预先规定了我活动的舞台，也指定了我应该演和所能演的角色。民俗学的活动在我们这东方的文明古国，虽然有较光辉的发生、进展的历史，但是，从现代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中国古代许多关于民俗事象的见解和资料记录，虽然很有学术意义，但是，到底还近于一种“原史”性质的东西。我们比较严格的科学的民俗学史，似乎应该从近、现代算起较为妥当。^① 因为学科起步比较迟，许多重要的工作有待着手进行。而对这门学科十分热忱并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同志并不多（中间还有一些只开了个头或走了几步就停止了）。加之，我国学界与之密切相关的其它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原始社会史等，情况也没有好得多少。因此，我们这种科学，尽管在 20 年代至 30 年代初期，由于附着在北大、中大等官立大学校，得到相当的发展机会，但好景不长，它们几如昙花一现——虽然影响是存在

^① 张汉东同志在 1993 年第 2 期《民俗研究》发表了《论汉代中国民俗学的形成》一文，所说值得进一步讨论。这里，我只依照学界的一般说法。

的。在上述那样的条件下，我们民俗学工作进行的艰辛就可以想见了。而我正是在那样的境况中挣扎和奋斗过来的。

我是一个天资平凡，而所处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都不是什么优越的学人。但是，从青年时代起就受了学界先辈和新兴学术活动的启发和影响，使我成为这门学问虔诚的信徒。我渐渐形成一种决心，要在我们这既贫瘠（主要指理论等）又丰饶或比较丰饶（指现实资料及历史遗产）的祖国学术土地上，建立这门科学的花林。因此，长时期以来，我尽力凭借一切能够利用的条件，单枪匹马或结合同志，在这土地上披荆斩棘，播种施肥，以促成它的生长和繁荣。这是历史课给我的庄严任务，而我不过是它勤恳的一个执行者罢了。

从 20 年代中期以来，我一直耕耘在这一块学术土地上。在前面提到的本学科的那些活动领域，包括各种支学，由于某些客观条件的容许，有不少方面我是跋涉过来的，有的还忝当了倡导者的角色。为了有助于同志们的了解和自己的省察、检查，我试就一些重要方面的活动情形简述一下。

（一）关于搜集、记录及整理工作 在 20 年代中期和后期，我就在收集、记录的基础上整理和出版了几个小册子，如歌谣集《客音情歌集》（1926）、《蛋歌》（1928）、《马来情歌》（1928）以及民间故事集《民间趣事》（1926），还做了古代歌谣的翻译和改编工作，如对清代学者、作家李调元主编、刊行的《粤风》的处理和出版（《俚僮情歌》，与刘乾初烈士共译；又有对《粤风》所集瑶、汉、蛋等民歌的改编、注释本。后者有顾颉刚先生序。1927）。此外，当时我还编过一部《两广地方传说集》，是以我自己征集和记录的稿子编成的，顾颉刚先生给它写过序。但该书未刊行。^① 那些

① 此书稿，记得我离广州时，曾留在中大民俗学会，后不知下落。

时期,我所搜录的口传故事,除了上述的《民间趣事》专集以外,还有一些单篇,分别发表于别的书刊上,近年才由张振犁教授收入《钟敬文采录口承故事集》出版(1993)。此外,我还采访、记录了当时海丰境内峯族和疍民的生活、文化资料,发表在当时广东、北京等大学的学术刊物上(现在均收入本书)。

总的看来,我在民俗学资料的搜录、整理上,的确做了些工作。但是成果并不理想——它粗糙、简陋,距离严格科学的水平颇为遥远。但我在青年时代,凭着一股热情和仅有的一点专业知识、技能,在我国现代这门学问诞生的曙光时期,奋力做了那些工作。它不仅在自己学术生活的历程上是值得记忆的,就是对于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初期历史,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吧。

(二)关于专业活动机构的建立工作 在我开始从事这种学问的活动时,就有幸参加了这方面的专业机构,即北大歌谣研究会(当时它是唯一的这方面机构)。但我当时(1925)远在广东,只是一个通讯会员而已。到了我第一次在中大工作的时间(1927),就有机会参与了该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的建立和风俗物品陈列室的设置工作,稍后又主持了民俗学传习班的事务。中大民俗学会的建立,虽然后于北大歌谣研究会,但规模比较宏大,事业比较广泛,而且,首次把“民俗学”这个名词冠于学会名称之上,其意义尤不容忽视。我当时年纪还轻(二十四五岁),资历甚浅,但由于自己的热心和某些客观条件的便利,做了许多工作。它对于我以后这方面的活动起了建基作用。

在杭州,我们继北大歌谣研究会、中大民俗学会之后,建立了“中国民俗学会”。这个学会没有大学可依靠,经费、人手都很感拮据。但是,由于少数人的拼死努力,居然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书刊,博得了各地不少青年和民俗爱好者的响应(他们纷纷成立组织,出版书刊),一时形成了中国民俗学运动的第二次复兴

的局面。这又一回使我领会到在推进一种新学术的活动上，专业机构的建立和运行，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全国解放后，民间文学、艺术，受到相当重视。我乘此机会，向文化部领导同志建议成立有关机构（第一次文代会开过后，我一时留京不南下，为的就是干这件事）。恰巧周扬同志等也有此意。我们于1950年春天，建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即现在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它在我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领导与推动作用。但是，那些时期，作为整个学科的民俗学却遭到冷遇。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因为与其历史、社会有关，多少被记录一些下来（但当时没有正式发表）。至于广大地区汉族的民俗事象，却没有人去记录。研究民俗的学问，在思想批判中，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学术”的黑帽子。人民文化的敌视者“四人帮”好容易被打倒了！学界响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钟声。当时我想，那久被打入冷宫的民俗学该是解放的时候了！

由于历史经验的启示，我认为要在新的社会基础上重兴民俗学，首先的一个任务，就是建立专业机构，联合同志，进行科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等工作。为了达成这种目的，1978年春夏间，我草拟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分头去请顾颉刚、杨堃、容肇祖、杨成志、白寿彝、罗致平几位同志签名，然后把它呈交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据说，当时在医院中的胡乔木院长见了颇感兴趣。在同年秋间，该院所颁发的应该研究的29种社会科学学科中，就列入了“民俗学”的科名。1979年冬，全国文联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我们又将倡议书，通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公开发表。这样一来，重建这门学问及其全国性机构的倡议，就成了学界大部分同志的共识和心愿了。

接着，一些省、市的民研会，相继成立民俗学研究小组或地方民俗学会。经一定时期的筹划、经营，我们终于在1983年5